



中华民富论

熊映梧 著



中
华
民
富
论

雄映梧 著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书 名 中华民富论
编 著 者 熊映梧
责任编辑 胡 凡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
邮政编码 210009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 扬州印刷总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4.25 插页 3
印 数 1—7100 册
字 数 330 千字
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—214—02073—4/F·409
定 价 (精)30.00 元
(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熊映梧,1929年10月生,湖北省松滋市人。早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,1986年获“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”称号。现任黑龙江大学教授、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名誉主席、中国生产力经济学会副会长。

他是当代中国较具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,主要著作《生产力经济概论》(1983)、《理论经济学若干问题》(1984)、《生产力经济学原理》(1987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)、《中国改革的理论思考》(1988)、《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》(1991)、《适度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对策》(1993),立一家之言,自成一派。

序

“富民论”，是一个古老的课题，历代先进人士作出了种种答案。但是，怎样使十几亿中国人富起来，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新问题、大问题。

作者有幸参加了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试验的全过程，饱尝了几十年的酸甜苦辣，目睹了大成功与大失败，积累了洋人及青年人不可能有的丰富的亲身感受，因而萌生了创作《中华民富论》的强烈愿望。我长期酝酿着这个写作计划，几度踌躇不前。我倒不在乎这种研究、写作活动是否合时宜，会招致什么灾难。经过多次政治运动、特别是“文革”的洗礼，反而变得坚强起来了，我尝以“曾经沧海不怕水”自诩。我担心的是自己是否有那么多的学问，能否胜任这样庞大的“写作工程”。我给自己取了一个别号：痴生。我就愿意

干一些别人认为是“傻事”、“吃力不讨好的事”、而我认定是有益的学术工作。我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四十多年,有一条深刻的体会: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不仅是辛苦的,而且是政治风险率最高的事情(至少在中国是如此)。但是,我宁愿在艰难而充满风险的社科研究道路上跌得鼻青脸肿,也不愿舒舒服服地坐在书斋里咀嚼前人的成果。

读鲁迅《自嘲》诗,突发共鸣,也胡诌了一首以明心迹:

年近古稀欲何求
标新立异屡碰头
本性难移惹是非
文章执著不随流
苦寻真理多蒙难
毁誉得失不计酬
岂顾舆论成一统
我行我素写春秋

这首歪诗就算作我写作《中华民富论》的态度吧!

《中华民富论》全书分为四篇、十二个问题,谈不上什么理论体系,但都是围绕着“怎样使十几亿中国人富起来”这个主题展开的。本书是作者一辈子研究成果的汇集。俗话说:“爹妈不嫌孩子丑。”不管人们对它的评价如何,我是珍惜这个几十年苦心培育的“孩子”的。因为,它终究是自己亲手创作的。

我很赞赏龚自珍的名言:“欲知大道,必先为史。”所以,本书从总结近代以至新中国的历史经验入手,去寻找

富民强国之路。我没有能力,也认为不应当先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,然后把复杂的现实硬塞进这个先验的理论体系中去。我不赞成照搬照抄别人的东西,我们在这方面吃的苦头多了,先照抄苏联的,现在又照抄欧美的。我认识的一位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英国博士 Peter Wood,他说:西方经济学界是“万家争鸣”,“两个经济学家在一起就有三派”,“中国人太听信西方经济学家的话了”。这个批评是中肯的。我主张对东西方经济学各派兼容并包,充分吸取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,植根于中国本土,创立中国自己的学派。而中国学派的创建,不是坐在书房里苦思冥想办得到的,而应踏踏实实去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,“积细流而成江河”。我愿为这条“大江大河”贡献涓涓一滴。

还要说明一点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本书研究的范围仅限于中国大陆,对于中国的另一部分——台湾、香港、澳门未曾涉及。

最后,我要感谢我的几位助手孟庆琳、张艺、王恺、吴国华先生,本书一部分研究成果,是同他们共同合作的结晶。

对于江苏人民出版社,特别是责任编辑胡凡女士,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劳,表示深深的谢忱。

1997 年仲夏

目 录

序	1
---------	---

历史经验篇

一 对中国近代富民与强国主张的评说	3
(一) 农本主义	4
(二) 重商主义与重工主义	8
(三) 民生主义	22
二 国情:富民之路的起点	35
(一) 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与制度的 可选择性	35
(二)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处于何种社 会发展阶段	40
(三) 新中国各个时期国情的判断	45
(四) 错综复杂的社会发展画面	57
三 富民纲领:消灭私有制,还是节制资本?	61
(一) 两种截然不同的建国纲领: 消灭私有制与节制资本	61
(二) 走快了,还是走错了路?	66
(三) 四十年的回归	90
四 计划经济:并非富民之道	98
(一) 唯一的选择:	

新中国采用计划经济制度	98
(二) 计划经济理论的由来	107
(三) 列宁、斯大林创建的苏联计划经济制度	115
(四) 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制度	126
(五) 计划经济制度破产的原因	138

改革篇

五 中兴之路:

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	149
(一) 物极必反:逼上改革之路	149
(二) 改革目标的逐渐明确	156
(三) 体制转变与时代主题	165
(四) 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几个难关	170

六 公民产权本位论

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	182
(一) 20 世纪的宝贵经验: 社会主义也有穷富之分	182
(二) 公民产权本位论	191
(三) 未来社会与知识产权	200

七 国企改革与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

(一) 改革的实质: 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	215
(二) 经济改革的决定性“战役”: 国企改革	221

发展篇

八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与生产力首位论	269
(一) “文革”后的思考: 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 生产力	269
(二) 生产力经济学应运而生	278
(三) 对生产力的系统分析	287
(四) 对生产力系统的动态考察	308
(五) 生产力的组织	316
九 经济发展战略与适度经济增长论	326
(一) 提出“适度经济增长论”的历史背景	327
(二) 适度经济增长的客观必然性	340
(三) 适度经济增长率的界定	351
(四) 两种经济发展战略的比较分析	356
(五) 实现适度经济增长的机制	363
十 21 世纪:	
中国经济大趋势	370
(一) 市场化	371
(二) 民营化	372
(三) 产权多元化	374
(四) 第二次工业化:农村工业化	374
(五) 经济增长转而追求质量	376
(六) 经济重心西移	378
(七) 大陆与香港、台湾将形成一个共同 市场	382
(八) 收入多元化与收入差距拉大	384

(九) 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:

人口、粮食、资源、环保 386

(十) 价值观念的变化:

官本位→商本位→学本位 387

反思篇

十一 中国与世界:

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再认识

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再认识 391

(一) 对立转向共处:

20 世纪末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 ... 391

(二)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398

(三) 中国怎样跨入 21 世纪 413

十二 世纪之交的经济学反思 417

(一) “凡是论”: 奴役中国人的精神枷锁 417

(二) 发展还是僵化:

80 年代初围绕《资本论》的一场学术

大论战 420

(三) 新时代呼唤新的经济学 428

(四) 21 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?

..... 434

历史经验篇

“欲知大道，必先为史。”本书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，来探讨富民的道理。

首先，对近代“富民”与“强国”两种主张作一番评述。我是一个“民富而国强”论者，主张“藏富于民”。

探讨富民之道，必先弄清国情。旧中国乃大穷之国，要使十几亿人民共同富裕起来，是十分艰难的事情。凭幻想决策，妄图一步登上天堂，是不会成功的。

富民的纲领是什么？历史经验证明，“消灭私有制”并不能实现富民的目标，而“耕者有其田”和“节制资本”为民众拥护，才是富民强国的康庄大道。

“以俄为师”，实行计划经济，这是新中国成立时的唯一选择。但是，几十年的教训表明，计划经济是热战冷战时代的产物，不适合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要求，决非富民之道。

一 对中国近代富民与强国主张的评说

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好传统。一些仁人志士“手无寸权，心忧天下。”每当国衰民困之际，总有一些先进人士站出来大声疾呼，提出种种“富民”、“强国”的主张，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光辉的篇章。

“民富国强”是许多仁人志士的共同心愿，但是有人主张先强国、而后富民；另一些人则认为民富是根本，以民富为基础的国家才是真正强大的。形象地讲，有人说“大河有水小河满”，有人则说“小河有水大河满”。

本书的宗旨是要探索中华民族富民之道，自然要以史为鉴，认真研究前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。我不是史学家，本书也不是思想史类的专著，故只是从近代历史上寻求一些对现代中国发展颇有影响的主张，同现代富民说作一番比较分析，从中引出有益的结论。

我接受了张锡勤教授的建议：不要按人物、而是以学说分类，去研究近代几种主要的、影响大的富民、强国主张。我还参考了张锡勤教授的

大作《中国近代思想史》^①，受益良多。

本书着重研究中国近代史上三类富民强国之说，即：

甲、农本主义

如龚自珍的《农宗》，太平天国的《天朝田亩制度》；

乙、重商主义与重工主义

如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，以郑观应“商战”和张謇“实业救国”为代表的私人资本主义；

丙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。

（一）农本主义

中国是以农业社会的文明著称于世，几千年来形成了强烈的“农本主义”主流思潮，从古代到近代均奉行“重农抑商”的国策。他们认为，发达的农业才是强国富民的根本。

中国的“农本主义”与西欧的“重农主义”虽只有一字之差，却反映了两个时代的要求。“农本主义”是要维护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；而“重农主义”则是要发展市场经济，推动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。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农本主义时，首先必须划清的一个界限。

《农宗》——龚自珍的改革方案

龚自珍(1792~1841)是中国近代一位忧国忧民的思想家。他看到清王朝从盛世走向衰世，大声疾呼改革。他写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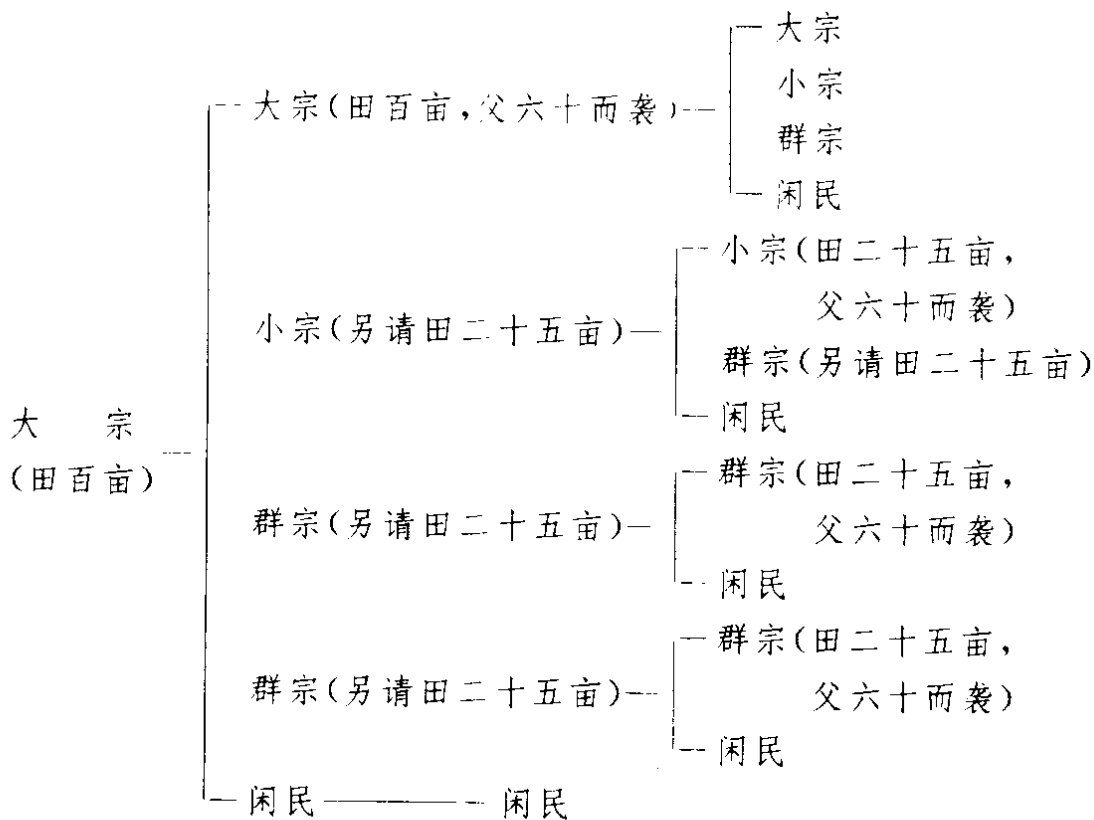
“一祖之法无不敝，千夫之议无不靡，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，孰若自改革。”(《乙丙之际著议第七》)

他认为，造成社会危机的经济根源在于“贫富不相齐”。“其始，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。小不相齐，渐至大不相齐；大不相齐，即至丧天下。”(《平均篇》)

^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。

龚自珍“渊渊夜思”而设计了一个“定民生”的《农宗》改革方案。其基本思想并非后世讲的平均主义,而是主张贫富“齐之以礼”,按封建的等级来限定贫富之差。《农宗》规定:按宗法地位,将社会成员分为“大宗”、“小宗”、“群宗”、“闲民”四等。农有田亩,由长子继承,立为“大宗”。次子为“小宗”,“另请田二十五亩”。第三四子及次子之次子为“群宗”,也“另请田二十五亩”。第五子以下及群宗之次子以下则为“闲民”,不授田,终身世代为佃。其中,大宗“役佃五”,小宗“役佃一”,“佃同姓不足,取诸异姓”。

《农宗》的设计方案可图解^①如下:



农宗有两个特点:

其一,强化宗法制度以维系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。正如吴昌绶评说的,龚氏“平生持论,特重宗法”。在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的世界大潮流背景下,鼓吹这套主张,显然是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。

^① 参见叶世昌:《中国经济思想简史》下册,第17页。

其二,排斥商品经济。龚氏认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是贫富不齐、社会动乱之源。他甚至设计这样的限制货币流通的方案:“百家之城,有银百两;十家之市,有钱十缗;三家五家之堡,终身毋口畜泉货可也。”(《乙丙之际塾议第十六》)他预期这样行之三十年,则“富民所吝惜,非货焉,贫民歆羨怨叹非货焉”,经商者也就将放弃商业,“退而役南亩”。由于大家都不再追求货币财富,于是天下也就不会再“扰扰贫与富之名”了(同上)。

龚自珍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,是当时的改革派,那么,他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《农宗》却不是进步而是退步的。怎样解释这种矛盾现象呢?

如果拿龚自珍同早他半个世纪的亚当·斯密(1723~1790)作一个比较,可以吸取一点有益的历史教训。斯密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,当时第一次产业革命蓬勃兴起,英国又是率先从农业社会转向工商社会的国家,市场经济颇为发达,所以,斯密能够写出《国富论》这样划时代的巨著;而龚自珍虽然比斯密晚半个世纪,但他生活在封闭式的中国农业社会,加之又不了解欧美的变化及世界潮流,因而提出《农宗》一类的方案,仍然跳不出农业社会的框子。我们都很欣赏龚自珍的著名诗句:

“九州生气恃风雷,万马齐喑究可哀。

我劝天公重抖擞,不拘一格降人才。”

可惜他空有报国的雄心壮志,却被封闭环境所蒙蔽,找不到治国的良策。这也许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锐意改革的思想家的悲剧吧!

《天朝田亩制度》——太平天国的经济纲领

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顶峰,历时14年,一度统治了半壁江山。《天朝田亩制度》是太平天国的施政纲领,在它统治区内以法令形式颁布实施;龚自珍的《农宗》不过是一介书生的建议,两者是大不相同的。

《天朝田亩制度》的基本思想,是洪秀全一贯倡导的反对私有